

# 洋务时期中国人对世界局势的认识

田涛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天津 300074)

**摘要:**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随着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基本建立, 中国被卷入了以欧美列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面对此种局面, 国人开始了对当时世界局势, 尤其是国际政治格局的认识过程。洋务运动时期, 分析、评判世局的论说大量出现, 构成了当时中国思想界乃至整个社会的主流话语。这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反映出来, 即对春秋战国与国际形势比较; 从均势角度对世界格局观察; 对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进行价值评判。从某种意义上讲, 当时虽然传统话语的强势地位尚未动摇, 但国人对世界的解读, 也可以理解为固有知识与思想传统的自觉延续。

**关键词:** 洋务时期; 中国思想界; 世界格局

**中图分类号:** K      **文献标识码:** A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随着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基本建立, 中国被迫卷入了以欧美列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前所未有的外在压力面前, 国人开始了对当代世界局势, 尤其是国际政治格局的认识过程。分析与评判世局的种种论说大量出现, 构成了洋务时期中国思想界乃至整个社会的一个主流话语。

本文以为, 就甲午战争前国人的世界印象而言, 最值得注意的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以春秋战国与国际形势的比附; 二是从均势角度对世界格局的观察; 三是对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的价值评判。本文以这三方面的描述为主要内容, 意图在于大致勾勒此一时期中国人对世界局势的基本理解, 还其思想原貌, 并作初步的讨论。

## 一、春秋战国的重现

在笔者检阅的文献范围内, 鸦片战争后对世界形势进行探究的人士中, 徐继畲较早流露出以春秋战国与当代国际格局相比附的意向。其所著《瀛环志略》介绍俄罗斯略称: “宇内疆土之恢阔无过俄罗斯者, 宜其强大莫与京矣。然在欧罗巴诸国中, 亦不过比肩英、佛(按: 法国), 而未能定霸于一方者”, “较之英、佛诸国, 总觉土满。舟楫之利、火器之精、心计之密, 又远逊于诸国, 逐鹿海隅, 往往瞠乎其后者。特因其疆土之广, 究系海内大国, 故诸国亦未敢轻视之。比权量力, 不过齐、秦、晋、楚相为匹敌已耳。”<sup>1</sup>徐继畲还认为, 欧洲小国如葡萄牙者, 则“不过滕、薛之类。”<sup>2</sup>其谓:

“欧罗巴情势, 颇类战国, 故纵横之策, 有不期然耳者。”<sup>3</sup>

徐继畲发议虽早, 但当时士大夫中具有世界眼光及知识者十分少见, 并未出现附和者。直到 19 世纪 60 年代, 徐氏之论才得到广泛响应。冯桂芬在 1861 年撰写的《校邠庐抗议》一书中称: “今海外诸夷, 一春秋时之列国也, 不特形势同, 即风气亦相近焉。”<sup>4</sup>张斯桂稍后则谓: “间尝观天下大局, 中华为首善之区, ……此外诸国, 一春秋时大列国也。”张氏细致地分析了欧洲各国形势, 喻俄罗斯为秦, 英、法为楚与晋, 奥、普为鲁与卫, 土耳其、意大利为宋与郑, 等等, 称:

“在昔春秋之世, 秦并歧丰之地, 守关中之险, 东面而临诸侯, 俄罗斯似之。楚国方城汉水, 虽众无用, 晋则表里山河, 亦必无害, 英、法两国似之。齐表东海, 富强甲天下, 美

利坚似之。至若奥地利、普鲁斯，亦欧罗巴洲中两大国，犹鲁、卫之政，兄弟也。土耳其、意大利犹宋与郑，介于大国之间也。瑞士、比利时国小而固，足以自守，丹尼、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昔为大国，后渐陵夷，然与会盟征伐诸事，亦能有恃无恐。而不至疲于奔命。其间蕞尔国不过如江黄州蓼，降为附庸，夷于邱县，或割地而请和，或要盟以结信，不祀忽诸，可胜道哉。”<sup>5</sup>

在对资本主义时代还无从进行更深层体会的前提下，以历史经验印证当代情势为国人提供了理解世界格局最简易便捷的途径。冯桂芬与张斯桂把欧洲情势视为春秋时代的再现，可以称之为洋务时期中国人对近代国际社会的第一印象。在他们看来，西方强国的环列并峙，无休止的攘夺争霸与扩张，以及频繁的交往、谈判、联合、分裂，凡此种种征象，与春秋战国时代都有着惊人的相似，当代世界的列国纷争、合纵连横，正是春秋战国历史的重新演绎。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这种比附之风在中国社会的流行，成为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发表此类论说的，既有具备一定的现代知识、以通晓时务而出名的思想家，也有亲历西方、留心观察了国际形势的外交官员，还包括一批并无名望的普通知识分子。郑观应称：“方今俄与英、美、普、法、澳（按：奥地利）日（按：西班牙）诸国，争逐海上，何殊战国七雄。论者谓：俄据形胜之地，逞强富之雄，辟土开疆，励精图治，则秦之连横也。英、美、普、法、澳、日诸国，立约要盟，练兵修政，悉意备俄，则六国之合纵也。”<sup>6</sup>王韬指出：“以春秋列国大势例之欧洲，普仅等宋、卫焉耳，英、法、俄、奥（按：奥地利）则晋、楚、齐、秦也。”<sup>7</sup>“欧洲诸国之在今日，亦犹春秋时之列邦。若俄、若普、若奥、若英、若法，何异乎晋、楚、齐、秦也。”<sup>8</sup>何如璋谓：“窃以为欧西大势，有如战国：俄犹秦也；奥与德其燕、赵也；法与意其韩、魏也；英则今之齐、楚；若土耳其、波斯、丹、瑞、荷、比之伦，直宋、卫耳，滕、薛耳。比年来，会盟干戈，殆无虚日。”<sup>9</sup>郑昌棎称：“予今环顾四裔，北则俄罗斯，西则英之印度，南则法属安南，东则日本、美利坚。陆有轮路相接，海有轮舟相环。虽其国都去中国数万里，远莫能及，而其爪牙则近在眉睫。彼皆厉精蓄锐，争以技胜。其术同，其交合，其情叵测，其志又各不相下。予以天下之大势观之，今日地球之上，乃一大战国也。”<sup>10</sup>持此论者或称：“欧西诸国，大小相维，迭为雄长，一春秋列国之势也。而迩年以来，德、奥、义合纵，俄、法连衡，则又将有大战国之机”，<sup>11</sup>或称：“今日之天下，一春秋之天下也”，或称：“今日欧洲形势，有如战国”，<sup>12</sup>此类论述，极其丰富，足可视为洋务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国际观念。

在上述这些比附言论中，以春秋战国论述欧洲形势最为常见。其原因在于：欧洲为19世纪世界舞台之中心，自然为国人注目之焦点；甲午战争前中国所承受的外在压力主要来自于欧洲，国人对世局的判断必然以自我感受为依据。在这一意义上，对欧洲格局的描述实际上代表了国人对世界局势的总体认识。

在这些比附性的论述中，国人为英、法、普、奥等欧洲国家拟定的角色并不完全相同，但把俄国视为“强秦”，则是相当一致的观点。“盖今之天下，一战国之天下，而俄则宛然一秦。”<sup>13</sup>王韬是洋务时期对欧洲形势最为关注的思想家之一，也是俄为强秦论的主张者。他认为，俄罗斯是欧洲最强大、又最具有吞并野心的国家，与秦国形势最相近，与俄罗斯壤地相接的土耳其犹如韩国，奥地利犹如魏国，普鲁士犹如赵国，意大利犹如燕国，而英、法两大国，则类似于齐国与楚国。至于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小国，“犹泗上十二诸侯也。”<sup>14</sup>较晚的黄庆澄则把美国也纳入了视野，认为英、法、德、美、俄五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有实力的国家，但各国形势又有所不同：“美创国才百余年，国势蒸蒸日上，然其立国务保太平，目前尚无力征经营之事”，“法虽强盛，考其国俗，叫嚣之气甚重。”英人属地最多，但“散漫可虑尤甚。故今日徘徊慎重，兢以持盈保泰为念。”俄国则得于地利，“气局之阔，如高屋建瓴，大有手擎六合，口吞八荒之概”，“一切设施布置，深沉明远，实驾列邦之上。”他声称：“天将成大一统之势，必先生一有势力者为之鹰犬，将一切土地人民收拾之，禁制

之，然后承其弊，突如其来，而坐享其利。如战国时而有强虎狼之秦，盖汉之鹰犬也。时贤皆目俄为今之秦，俄殆德之鹰犬欤！”<sup>15</sup>钱文沛称：“窃以今日战国之势，观诸昔日战国之势，则今日之强俄，犹古之强秦也。古之并六国者惟强秦，窃恐今日并四国者，即在强俄也。”<sup>16</sup>这一判断在甲午战争前影响极大，国人纷纷以六国合纵之势描述欧洲列强对俄国的戒备，所谓“非预谋合纵，何足以力摒强秦”，<sup>17</sup>表明了俄为“强秦”论在社会上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从鸦片战争之际的林则徐开始，国人对俄国的扩张欲望始终予以相对强烈的关注。魏源曾称俄罗斯“为欧罗巴洲最雄大国。”<sup>18</sup>徐继畲在叙及英、俄在中亚地区的争夺时则表示：“英人之取印度也由海，俄人之窥印度也由陆，论巧则俄不如英，量力则英不如俄，两国之在西土，可称勍敌，数十年后，当不知作何变动矣。”<sup>19</sup>隐然预示了俄国必将崛起，成为世界最大的威胁。俄为“强秦”论当有这一思想因素的继承。据19世纪70、80年代的欧洲列强国际形势而论，英国的鼎盛时期正在渐次结束，德国已露兴起之势，但基本的均势格局并未被打破，俄国并不具备征服整个欧洲的能力。事实上，俄国之所以被视为欧洲乃至全天下的最大威胁，主要基于国人对俄国地跨欧亚的疆土和同样宏阔的扩张野心所留下的强烈印象：“跨两洲之地，负北冰海而立国，利则乘时进取，不利则蓄锐观变，有长驾远驭之谋，有居高临下之势。”<sup>20</sup>与中国壤地相接的俄国使国人感受到强大而持久的压力，王韬对普法战争后欧洲格局的分析就能证明这一点。他指出，普鲁士在欧洲崛起，并不会波及到亚洲及中国：“今日之欧洲，据时势以立论，普、俄两国虽为雄，然普虽强，仅能持欧洲之变局，而与亚细亚无与也，于我中国更无所关系。盖普但能弱法图英，以驾御欧洲诸国，而不得为中国患，何则？以距中国远也。虽鞭之长不及马腹。”但俄国的形势则不同，“若俄则地跨三洲，控弦百万，于阿非利加、亚细亚两洲皆足系于重轻。”<sup>21</sup>显然，国人对俄为“强秦”的强调，主要出于自身的主观体验，而多少有失真之处。

王尔敏在《十九世纪中国国际观念之演变》一文中，对时人此类比附言论曾进行过细致论述。王氏认为，以春秋战国的霸业争持来比拟欧洲列强的对立竞胜，不应以现代眼光尽视为固陋、傅会、浅薄。“但就思想观念演变过程观察，当具有时代意义。”表明固有的知识经验，在遭遇新问题时发生了自然的潜在影响。对古旧史例的参考，实有助于认清当前国际现势。“本之于此，可以自中国中心观念顺利转渡到对等国际关系之体认。”<sup>22</sup>应该说，此种认识确为公允之论。在传统的华夷观念已不足以解释当代世界、近代政治理论还不为国人了解与接受的情形下，把当代世局视为春秋战国的重现，从历史经验出发推论近代国际情势，有助于国人了解19世纪欧洲与世界的基本态势，促进天朝意识向近代世界观念的过渡。以处于不同文明空间的春秋战国与19世纪的世界相比拟，尽管不无荒谬之处，但毕竟构成了中国人世界观念演变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话语阶段。

在另一方面，这种比附又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问题：受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传统思想藩篱的限制，洋务时期国人在对世界格局的观察和理解过程中，仍隐然可见旧式天下意识的影响。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难以放弃中国为天下共主的理想与信念。薛福成称：“盖中国人民之众，物产之丰，才力聪明礼仪纲常之盛，甲于地球诸国。既为天地精灵所聚，则诸国之络绎来会者，亦理之固然。”<sup>23</sup>在一段颇具匠心的论述中，薛氏谓：

“今地球大势，颇似春秋之后战国之初。俄罗斯以一面制三面，诸国畏之忌之，如六国之摒秦。而俄之日趋强盛，颇似秦献公、孝公之时。英国之势，与俄相匹，而富强过之，殆犹楚宣王、威王之时，初并吴越，地广人众，而衰微尚未见也。法兰西本霸国之余，拿破仑第三其犹齐闵王乎？德意志以贤才勃兴，地不甚大，而国势可以抗英、俄，殆犹赵之几于秦、楚相匹乎？美国僻处一洲，自辟疆土，亦犹燕之僻在一隅，而战争之祸较寡焉。奥斯马加、意大利四战之国，犹韩、魏也。中国尚文德而不竞武力，颇有宗周气象，然犹似在春秋之前，非若战国二周之弱小焉。土耳其处两大洲之中，为英、俄、法所窥伺，孰先得之，皆足以广地而张国势，恐不免如战国之宋，为齐、楚、卫所分裂也。日本国虽小，常有与诸国颉颃之

意，其犹中山乎？其余诸国，殆如泗上十二诸侯焉耳。”<sup>24</sup>

“就天下大势而论，为春秋时一大战国，……五方并峙，约纵连横，其堂堂上国，居正朔而大一统者，其惟我中华乎！”<sup>25</sup>这种表述在洋务时期虽然并不多见，但从时人的精神状态推测，它仍不失为一种普遍性的意识。中国的沦落和西方世界的崛起使国人充满了精神上的无奈，以孱弱的周室自况不无聊以自慰之意。而在另一方面，尽管国人不得不承认了中国已由天朝上国跌落为“万国之一”的现实，承认今日世界已由“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外联属之天下。”<sup>26</sup>但在潜意识中，夷夏之辨与中外有别的传统观念仍不无支配的效能。

## 二、对世界均势格局的认识

均势是近代国际关系中一项主导性的原则，也是维持大国力量相对平衡的重要机制。在19世纪的国际政治中，以大国制衡为特征的均势格局有十分明显的体现。

对欧洲均势学说的最早介绍，出现在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所译《万国公法》一书中。该书声称：“欧罗巴诸国常以土耳其之自主不分裂，与均势之法大有相关”，“土耳其与奉教之国交际，恃其保护，……然土耳其能自主自立，不被他国征服割据，此乃欧罗巴均势之法最要关键。”“故一国强盛过分，恐有不遵公法而贻患于邻国，故欧罗巴大洲内，倘国势失平，诸国即惊惧张皇，且必协力以压强获弱，保其均势之法。”<sup>27</sup>“所谓均势之法者，乃使强国均平其势，不恃以相凌，而弱国赖以获安焉，实为太平之要术也。”<sup>28</sup>同样由丁韪良翻译、出版于1880年的《公法会通》则对均势理论进行了更详尽的论述。其云：“公法有均势之论，非谓各国应幅员无狭阔，势力无强弱，人民无多寡之别。盖邦国之根由各殊，其风化人情不同，而天气地土又复互异，自不能不分为强弱，故凡此既出于自然之理，讲求公法者固不得漠然处之。”<sup>29</sup>“公法所谓均势，无论国之大小，以彼此不相侵夺为要。遇强横之国侵夺他国自主自立之权者，各国应群起而匡救之，务使彼此相安。”<sup>30</sup>这些把均势视为“太平要术”的介绍，虽然模糊了均势为权力竞争的实质，但毕竟使国人对均势理论有了初步的印象，并在他们对世界局势的认识过程中发生了显著影响。

在洋务时期国人对世界政治体系的观察和理解中，均势是一个重要的评判角度。他们以“均势之局”概括近代以来的欧洲形势，或称“欧洲大局，几于固结莫解，大有一国动诸国皆动，互相牵涉之势。”<sup>31</sup>或称“各国环列，互相钳制”，<sup>32</sup>“大小相维，强弱相制，盟约相联，莫能相并。”<sup>33</sup>马建忠指出：“夫欧洲列国，壤地昆连，虽一境之文治武功由我独断，然保无有狡焉思启者，乘间抵隙以为与国虞，于是诸列国申盟要言，以强弱相恤，大小相维，成一均势之局。即战国合纵连横之说，名异而事同者也。而欧洲自胜朝之末以迄于今，交涉之道专主于此。”<sup>34</sup>这种分析和认识，表明均势已成为国人理解当代世局的一个基本依据。

对欧洲乃至世界均势格局的描述，与以春秋战国比附国际形势的思考方式是相联系的。在时人的理解中，所谓均势，无异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古之战国，居亚细亚洲之一隅，而约纵连衡者七国；今之战国，居欧罗巴洲之全境，而约纵连衡者五国。”<sup>35</sup>热衷于这种比附的王韬，对当代世界的“大小强弱相维之势，连衡合纵之情”<sup>36</sup>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在分析普法战争后欧洲形势时指出，欧洲大国势均力敌是维持欧洲秩序的基本保障，“昔之英、法常相攻，以其时欧洲诸国势均力敌，皆不足以制英、法也。今之英、法常相合，以俄骤兴于东方以制土强，普崛起于西境以制奥强，皆足与英、法抗衡而为难。以英、法、普、俄四者并峙，可以维持欧洲，互相牵制，以幸无事。四者之中，弱一个焉，则必不能成鼎足之势。”<sup>37</sup>均势格局遭到破坏，将会使欧洲小国陷入危险的境地：“普、俄雄，英、法竞爽，可以纲纪欧洲，今弱一个焉，其将成鼎足之势乎？欧洲诸小国其危殆。”<sup>38</sup>因此，“在今日欲维持欧洲之大局，莫如普与英合，普、英合则足以制俄，而势力既均，欧洲诸小国可无蚕食之虞。”<sup>39</sup>他声称：“今日欧洲之大局，亦无异于昔日之春秋战国，俄则秦也，法则齐也，

英则楚也，而普、壤犹韩、魏也。普、壤强则俄不能出西欧一步，犹之韩、魏强则秦只闭关以自大耳，势不能渡函谷、逾大梁、出井陘，越国以鄙远也。故六国之失计，在不能强韩、魏以制秦，而欧洲之相安者，昔则在英、法助土以攻俄，今则在普、壤相合以御俄。”<sup>40</sup>

在国人看来，欧洲“鼎足之势”的形成，是大国相互对峙的结果。而这种格局的出现，又制约着列强的行为，成为维持欧洲形势相对稳定的保障。“是盖互相维持，亦互相钳制也。”<sup>41</sup>所谓“泰西各国势均力敌，互相猜忌，从不容独肆鲸吞”，<sup>42</sup>正反映了国人对均势制衡意义的认识。冯桂芬认为：“诸夷意中各有一彼国独强而我国将弱之心，故一国有急难，无论远近辄助之，盖不仅辅车唇齿之说，其识见远出乎秦时六国之上。如土耳其欲并希腊，俄、英、法救之；俄欲并土耳其、西班牙欲并摩洛哥，皆英、法救之，迄归于和。”<sup>43</sup>李鸿章 1879 年声称：“泰西通例，向不得无故夺灭人国，盖各国互相通商而公法行乎其问。去岁土耳其为俄所伐，势已岌岌，英、奥诸国出而争论，俄始敛兵而退。向使土国孤立无援，俄人已独享其利。又欧洲之比利时、丹麦，皆极小之国，自与各国立约，遂无敢肆侵袭者，此皆强弱相维之明证也。”<sup>44</sup>陈虬指出：“按万国公法，欧罗巴大洲内，倘国势失平，诸国即警懼张惶，且必协力压强护弱，保其均势之法。盖一国强盛过分，恐其有不遵公法而貽患邻国也。”<sup>45</sup>还有人称：欧洲“凡一国有意侵占小国土地，于邻国主权国势不无妨害者，他国得群起阻挠之以遏其势，是之谓均势之法。盖弱国为强国所欺，幸有均势之法以维持而调护之，无论大小各国，皆足自固其邦家，而兵端籍可少息。”<sup>46</sup>这些言论虽然不无夸张之意，但表明国人对均势原则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已有相当理解。

均势格局对中国的影响，是洋务时期国人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甲午战争前一种普遍的认识是：欧洲列强虽然对中国不无威胁，但受制于均势格局，任何一国都很难在中国肆其所欲。他们分析了中国国际处境的危险性，指出：“倭逼于东南，俄环于西北，而英、德、法、美诸雄皆不欲其得志于中国，非爱中国也，嫉其强盛将无益己也，是以公法不尚兴灭，战胜者割土地偿兵费而已。英有香港、法有越南，德于大孤山、台湾岛皆所覬觐，无他，欲为立脚地耳。苟有一国争于前，势必各国踵其后，静则坐观成败，动则各踞险要，此各国之形势然也。”<sup>47</sup>然而“目前尚无事者，非力或有所不足，而势实有所不能也。……盖俄、英、法诸国，地丑德齐，外睦内猜，互相钳制，而莫敢先发。”<sup>48</sup>在这种格局下，即使是素有吞并之志的俄罗斯也难以在中国肆其所欲：“查外洋各国，以俄罗斯为极强大、极贪狠之国，地近我疆，时生窥伺覬觐之志，幸为欧洲各国所忌，未敢公然肆其强暴。即英、法、德及凡在欧洲各国，亦无不彼此猜忌。盖因其目下彼此土地甲兵已属势均力敌，若再得志东方，势更难制，此万国公法只准赔费削权、不准灭国之条所以立也。……是以中国土地虽为各国所垂涎，且深知我国水陆器械非其所敌，而卒无一国敢为戎首轻于一试者，职此之故。”<sup>49</sup>

国人认为，在当代世界的均势格局下，讲求合纵、连横、结盟、联与国等等方策，不失为中国立足于国际社会之道。既然“泰西皆有独亲独厚之国，以备缓急相为扶持”，<sup>50</sup>中国也“宜有一二强大之国，深与接纳，以为外交。”<sup>51</sup>在甲午战争之前，联英拒俄或联英、法以拒俄，是最有影响的结盟设想。陈炽声称：“今天下强国惟俄罗斯，可以敌俄者惟英吉利。……亚洲之可以敌俄者，惟中国也。英与中、德之交不绝，则四海升平之局虽再阅数百年可矣。”<sup>52</sup>王韬也以为，欧洲只有英国能够与俄国相抗衡，英国与法国的联合可以遏制俄国在西方的扩张，“俄既不得逞其西略，则将肆其东封。俄势日东，则其强益甚，举天下之利权尽归掌握，英、法至是虽欲争而不得矣。然则必欲牵制乎俄，天下诸国无能当之者，惟中国则庶乎可矣。在欧洲诸国为今日计者，莫若英、法强中以御俄。中国幅员之广过于俄、美、英，而生齿之繁几半地球。近来仿制船炮，技美法精，机器日兴，艺巧迭出，诚得英、法以为助，其强当无敌于天下，于御俄乎何有？此非英、法为中国，实英、法自为计也。不然者，英、法离，普、俄亲，中国弱，东土蹙，普为俄用，遂展雄图。恐法削而英亦将不竞，天下事从此殆哉。有心于天下大事者，当不河汉斯言。”<sup>53</sup>

类似的结盟主张还有很多。薛福成认为中国应以美国为强援，<sup>54</sup>郑观应建议中国或与英国联合对付俄国、日本，或结俄、德、美以拒英、法、日。<sup>55</sup>王之春则认为“首宜交德，次宜交美，以及瑞、丹、普、日（西班牙）和、比、义、奥诸小国，皆宜联络输诚，结以信义。非必藉为外援而荷戈持旻，供我驱策，第使之不为人助，即不啻为我助，以夷制夷，所谓以毒攻毒也。”<sup>56</sup>他如联日抵俄，和日亲俄，联俄拒英，亲俄拒日等等，皆为时人曾提出过的设想。中法战争时期，张佩纶、陈宝琛等建议与德国结盟以制衡法国，“足分其势而扰其谋。”<sup>57</sup>岑毓英则建议在德、英、美、俄四国中“择其可以联动者”，“并力夹击”法国。<sup>58</sup>这些主张并不能指出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真正出路，正如论者所指出的，英国“与我非辅车之相依，非唇齿之相关，方且据我香港以擅我利，方且夺我缅甸以弱我之藩，设我后日者因保朝之故而有事于俄，英不助之为虐，而因之为利者也多矣，岂肯助我？即使助我，我岂得恃之无恐，而绝不思奋发有为乎？”<sup>59</sup>就洋务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而言，并不具备参与这种大国游戏的资格，这些设想难免肤浅，但依据均势格局确立中国国际地位的意向，仍有其启示意义。

均势观念的影响，也体现在这一时期国人为边疆危机而提出的种种应对之策中。利用列强相互制衡的局面，通过开放藩属均列强之势，以解除中国所面临的侵略危险，被时人视为最具可行性的方策。在朝鲜问题上，郑观应提出过由各国共同保护的设想，“一若欧洲之瑞士、比利时、土耳其，无论何国不得贪其土地，最为妙著。”<sup>60</sup>何如璋有“藉他国之力，以相维持”<sup>61</sup>的主张，黎庶昌也建议“联合与国共保之，如瑞士、比利时之属。”<sup>62</sup>在越南问题上，薛福成建议“导越南联络英、德诸国”，<sup>63</sup>彭玉麟主张越南与泰西诸国通商，“则法人举动有大悖乎公法者，诸国必起而议之”，“法必有所顾忌，而越或可与图存矣。”<sup>64</sup>王韬也认为这是杜绝法国觊觎最有效的方法，把保全越南的希望寄于“诸国必群起而议之。”<sup>65</sup>在暹罗问题上，当时也有人建议，由中国“与英、法、德、美等国约，缅、越之事已矣，即暹罗我亦不欲私为己有，今令其为自主之国，而保护之责敢与诸国共。开埠通商，各国均之，出英、法之不意，而预破其阴谋。”<sup>66</sup>凡此种种，其意图都在于以开放为手段，形成列强各不相让的格局，即所谓的均势局面，达到保全藩属的目的。

从均势角度对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局势进行观察和认识，并由此思考中国的立足之道，表明国人对近代国际政治已有所领悟。但这一时期国人的均势观尚不能等同于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国际观念，而是在历史经验、传统驭外方策与西方政治原则共同诱发下形成的混合理念。利用夷狄之间的矛盾，令其互相制约，以解除中国所受到的威胁，是中国处理外夷事务的一项传统手法。鸦片战争后，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曾把以夷制夷视为抵御西方侵略的重要手段。随着西方列强势力的东渐，“春秋战国”格局的逐渐清晰，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它的影响。所谓“古来攘夷之策，以夷制夷，则事半功倍”<sup>67</sup>之类的言论，屡为洋务时期的国人所重复，表明固有历史经验在新时代被重新激活。在他们看来，当今世界“诸国鼎峙各不相让”<sup>68</sup>的格局，正合乎以毒攻毒、以敌制敌的现实需要，以寻求国际政治势力均衡为内容的均势原则，在一定意义上佐证了以夷制夷理念的合理性。国人对均势的热衷，显然具有这一思想因素的作用。

在洋务时期国人对世界均势格局的认识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误区是倾向于把均势视为维持国际公平、抑制争战攘夺的正义性原则。郑观应把均势直视为维护国家权利的依据，指出：“夫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为民主，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他人不得侵夺之。良以性法中决无可以夺人与甘为人夺之理。故有均势之法，有互相保护之法。国无大小非法不立。”<sup>69</sup>李鸿章甚而声称：“倘遇一国有侵占无礼之事，终可邀集有约各国会议其非，鸣鼓而攻。”<sup>70</sup>在相对发育成熟的欧洲基督教国际社会，大国之间的权力争夺，确实使小国获得了一定的生存保障，但在殖民侵略浪潮中被纳入世界体系的落后国家和民族，则只能成为大国政治的附庸和砝码，而不可能具备平等的地位。洋务时期的国人过分渲染均势的制衡作用，强调均

势的道德意义，却忽略了均势为权力竞争的实质。“公法虽有均势之理，于邦国权势之增减无所阻碍，盖邦国之盛衰，犹草木之枯荣，皆出与自然之理，而公法不能不许之也。”<sup>71</sup>正如汤震所指出：“在公法虽有均势之名，以彼独强此独弱。而于我中国则惟恐不弱，谓夷人于中国贪互市不贪土地，殆谄于势者之言也。”<sup>72</sup>在全球性的殖民竞争时代，强国之间相互妥协和制衡使均势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机制，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不是保证各个民族与国家主权利益的现实性法则。对纯粹利己主义的追求才是国际政治最本质的特征，“向来欧洲一国欺侮他洲之国而但坏各国商务者，各国犹观望而不肯阻止，必待妨害各国权利，方动各国之公愤。”<sup>73</sup>国人对均势的误解，表明他们对国际政治本质尚缺乏更深的认识。

### 三、以理为本：对国际政治秩序的价值评判

在洋务时期中国人对世界局势进行的种种论说中，对世界政治体系进行价值评判是一个始终的主题。在当代的国际政治中，道德是第一位，还是权力是第一位，国际社会是以正义原则为支配，还是受制于强者的意志？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体现在国人有关“理”与“势”的种种分析和认识中。

依据传统的夷夏观念，中国以外的国家都被视为蛮夷之邦，无所谓“礼”与“理”行乎其间，这是华、夷之间的界限所在，也是确定世界秩序的基本依据。洋务运动时期，随着对西方世界的认知，国人已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即西洋列国已具有高度的“礼乐教化”，不能以古之蛮夷相比，华夷世界秩序已不复存在。与此同时，他们也不能不承认欧洲列强扩张与征服的现实，在他们的描述中，“欧洲各国兵日强、技日巧，鲸吞蚕食，虎踞狼贪，环地球九万里之中，无不周游贩运。”<sup>74</sup>“泰西诸国，亦惟知专务财用，保护商人，其制造格致，精益求精，心思灵敏，遂致东吞西并，弱者益弱，强者益强，创千古未有之奇局，辟千古未有之奇境。”<sup>75</sup>在这样一个列国攘夺的时代，究竟有无秩序与规范的存在，如何评判西方国家的行为？面对这一个新课题，国人的心态是复杂的。

对国人而言，列强的肆意扩张使他们形成了一个直接的印象：当今世界是以实势为依据、“尚力而不尚德”的时代。“方今梯航四通，中外已成列国兵争之局，我自强则乘欧洲争轧，可全亚洲而王之；我不自强则譬诸投骨于地，而待群犬之相牙，骨不尽不止。”<sup>76</sup>他们观察到，在欧洲国家的商业拓张中，强权是最重要的后盾，“一遇商人受亏，小则赔偿，大则兵戎相见，以强胁弱，以大制小，尚力而不尚德，虽修好订约，载在盟书，而小忠小信之所为，万不能久长相恃，此亦风俗世界之一大变也。”<sup>77</sup>因此，以“势胜”而非“理胜”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生存原则，“大凡与外洋交涉，以理胜不如以势胜，势胜则理不足而可强以为足，势不胜则理虽足而仍以为未足。”<sup>78</sup>这些判定，表明他们对19世纪国际社会的强权政治真相已有相当的认识。

遭受殖民侵略的现实境遇，使洋务时期的国人不能不承认强权为世界的支配性法则。但问题并不只是这样简单。资本主义时代所具有的现代理性与文明，又使他们更倾向于相信西洋世界也有“理”的存在。在以春秋战国形势比拟当代世界的言论中，很容易看到这种思想的痕迹。在国人看来，春秋与战国虽然都呈现出霸权争夺与邦国对峙的格局，但还是有区别的，春秋尚有礼与信的遗迹，而战国则为纯粹的强权对抗。国人以春秋战国解释当代世局的过程中，大致使用了三个词汇：一是视之为春秋时代，一是在春秋战国之间，一是为战国时代。导致这种差别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发表议论年代的不同——19世纪下半期资本主义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变量，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时代的过渡，使国际关系格局也发生着明显的变化。但在另一方面，对于持此种比附观念的国人而言，这种细微的区别也至少部分地反映了他们对当代世界政治秩序不同的价值评估。以冯桂芬为例，尽管他仍然把西洋列国称为“夷”，然而却是有“礼”有“信”，也“论理”、“论信”之邦，而倾向于把西洋形势视为春秋时代，

“势力相高，则言必称礼；谲诈相尚，则口必道信；两军交战，不废通使；一旦渝平，居然与国。亦复大侵小，强陵弱，而必有其借口之端，不闻有不论理、不论信，如战国时事者。”<sup>79</sup>在他看来，西洋的“信”虽为“不得不信”，但毕竟使“理”得以行乎其问：“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制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据理以折之，诸夷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非真能信也，一不信而百国群起而攻之，钳制之，使不得不信也。”<sup>80</sup>郭嵩焘对西洋的观察结论则是：“西洋诸国所以维持于不敝，皆由学士大夫酌理审义，相与挟持于其间，所以为不可及也。”<sup>81</sup>在他看来，“西洋考求政务辄通各国言之，不分畛域，而其规模气象之阔大，尤务胥天下而示之平。”<sup>82</sup>这种风度甚至还远远超过了春秋列国：“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二千年。麦西、罗马、麦加迭为盛衰，而建国如故。近年英、法、俄、美、德诸大国角力争雄，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sup>83</sup>尽管这些认识不无郭氏观察上的错觉，因为外交行为乃至西洋社会的彬彬有礼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国家政治行为，但毕竟表明他承认“理”在西方世界的存在。

如此以来，折衷性的“理”、“势”并存，就成为国人理解当代国际政治秩序的当然选择。马建忠以“理”、“用”兼备为外交因应之道：“专论夫理者，遇事每仓皇而失措；泛求其用者，临时转窒碍而鲜通；是必理用之兼备，庶可泛应而曲当。”<sup>84</sup>黄庆澄则认为，证之于中国与西方的交涉之案，“即据理力争，终无以钳彼之口而折彼之舌”，“然鄙意以为，我即不能据彼之律尽与之争，而彼不能授我以口实，则我之理愈直，气愈壮，以视今之隔靴搔痒者，不大有间乎？……天下事固有有之不足恃，无之则不可者，羊存礼存，圣人早有明训矣。”<sup>85</sup>“理”与“势”不可或缺，代表了洋务时期国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态度。

在这一解释过程中，国人又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思考趋向。一种倾向性见解是，在“理”、“势”并行的国际政治中，西方国家拥有的“势”具有最终的决定性。“理足而无势，则理不能伸；势强而无理，则所争者虽胜而为人所嫉。今地球各国，其强者大抵恃势而无理，其弱者大抵皆有理而无势。”<sup>86</sup>“天下之理，必待天下之势以为衡，而理乃能圆足。若只论是非，不论强弱，则势既窒碍难行，理亦凭虚而无著，转不能通行天下。”国家行为的是非，是以国势强弱为转移的，“夫法被德蹙，俄人遂背墨海之盟，英、法固无如之何也，土被俄残，柏林不改瓜分之约，各国亦无如之何也。此在欧洲犹专以势言，矧为亚细亚与亚美利加两国交涉之事乎！”<sup>87</sup>

另一种倾向是，承认“势”的意义，但“理”仍然是根本性的法则。郭嵩焘在这方面的认识颇具代表性。在他看来，“西洋各国环集中国，无可战之机，无可战之势，直亦无可战之理”，所以，“应付之方，不越理、势二者。势者，人与我共之者也。有彼所必争之势，有所必争之势，权其轻重，时其缓急，先使事理了然于心，彼之所必争不能不应之者也；彼所必争而亦我之所必争，又所万不能应者也。宜应者许之更无迟疑，不宜应者拒之亦更无屈挠，斯之谓势。理者所以自处者也，自古中外交兵，先审曲直，势足而理固不能违，势不足而别无可恃，尤恃理以折之。”<sup>88</sup>他声称：“凡洋人所要求皆可以理格之，其所抗拒皆可以礼通之。”<sup>89</sup>尽管这些言论主要针对“以和为辱，以战为高”<sup>90</sup>的士大夫虚骄习气而发，但他显然是把“理”作为衡量当代世界最根本的标尺，所谓“衡之以理，审之以天下之大势，而其情亦莫能遁焉。”<sup>91</sup>并坚信“理”的最终决定性，即：“天下事一理而已，理得而后揣之以情，揆之以势，乃以平天下之险阻而无难。”<sup>92</sup>

推己及人、以天理人情度量西方世界，使人们无从怀疑理的普遍性。“欧洲之于中国，路隔十万里，风俗不同，形貌不同，言语不同，文字不同，衣服不同，而不忍之心，爱人之情，则无不同。”<sup>93</sup>郑观应称：“泰西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其风俗各有不同，其义理未能或异。”<sup>94</sup>在洋务时期的思想家中，王韬对国际政治中的强权有更深的认识，但在他看来，即便是最具竞争实力的国家，也不能靠强权保证其生存：“不知天下大势，惟理可以持之，岂独尚力哉。苟以力陵人则鲜不蹶矣，法之已事，其明验也。”“夫睦大

国保小邦，以期相安于无事，维持于不败，此公也，非私也。”“理之所在，众自助之，能集群力以为力，能合众心以为心，则又何兵寡之足虑。”“不以大德宰之，元气安能久长也。”“盖徒讲武备，尚兵力，刻鹗奋厉，以相倾轧而慑制，则必有一蹶者矣。”<sup>95</sup>这些言论也都表明国人对于国际政治中“理”所具有的最终信心。

对“理”的强调，使国人倾向于承认理性与道德在国际政治中的根本性地位。李鸿章认为，国际政治格局的维持依赖于国家之间的制衡，所谓“各国通商公共之口，一国不能独占，占之则必群起而争”，同时又表示：“泰西通例公法，无故无称兵夺人土地者”，“泰西通例，向不得无故夺灭人国。”<sup>96</sup>郑观应描述说：欧洲之瑞士、比利时、土耳其由各国共同保护，“无论何国不得贪其土地。”<sup>97</sup>曾纪泽谓：“西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制，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自主之权。”<sup>98</sup>薛福成谓：“西法凡入万国公会者，邻邦不得无故启衅，同盟诸国必善为维持。”<sup>99</sup>彭玉麟称：“欧洲诸国素以不灭人国为美谈”，如果有背弃公法之举，“诸国必起而议之。”<sup>100</sup>丁日昌认为“泰西无灭绝人国之例。”<sup>101</sup>他如“侵削小邦，大千万国公法禁例”、<sup>102</sup>“泰西各国，……从不容独肆鲸吞”<sup>103</sup>等等，这些言论的大量出现，都表明了国人在对国际政治认识过程中以“理”为本的思考趋向。

循着以“理”为本的思考路线，洋务时期的国人设计了中国的对外之道。郭嵩焘谓：“能以诚信待人，人亦必以诚信应之，以猜疑待人，人亦即以猜疑应之。此理无或爽者。”<sup>104</sup>“交涉西洋通商事宜，可以理屈，万不可以力争。可以诚信相孚，万不可以虚伪相饰，可以借其力以图自强，万不可恃其强以求一逞，臣尝论西洋要求事件，轻重大小，变幻百端，一据理折衷，无不可了，一战则必不易了。”<sup>105</sup>王之春称：“凡遇交涉之事，悉以和平中正之心，行其忠信笃敬之道，未事无虚骄，临事无牵延，有事无畏惹，无事无慌急，事之应理者，始终如一以行之，事之不可允者，百折不回以绝之，据公法、合约为辩论，本人情物理为周旋，即或自作不靖，则曲在彼而兵威不扬，我有备而同心敌忾，又何畏彼之坚甲利兵也哉？”<sup>106</sup>在洋务时期内外官员的对外方策中，诸如“责以大义，示以公法”、<sup>107</sup>“举众国之公法以破其诈”、<sup>108</sup>“布告中外，大申天讨”、<sup>109</sup>“布告各国，显与之绝”<sup>110</sup>乃至使各国“激于公法，兴师问罪”<sup>111</sup>之类语汇的大量使用，以及对所谓“仁者无敌之效”<sup>112</sup>的强调，正反映了这种认识的普遍性。

就表面来看，对国际政治中“理”的承认，是国人对当代世界局势观察得来的结果，但在实际上，这一信念获得的支持更多地来自于传统的思想资源。在中国哲学中，理作为基本的精神信仰，是万物的主宰，具有不可置疑的权威性，它成为洋务时期国人对国际政治体系进行价值评判一个基本的思想预设。正是以此为根据，国人推演出了“理”为国际政治之本、为世界最终依归的结论。从一定角度看，郭嵩焘等人对西洋之“理”的肯定，对“理”的普遍性的论证，其意义只在于为这一结论提供了必要的逻辑铺垫。对国际政治以“理”为本的判断，既掺杂了国人对理想时代的向往，又隐含了他们对资本主义殖民竞争时代的无奈和不适应。尽管这种判断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人在新时代所感受到的巨大压力，却影响了他们对国际政治现象进行本质性的观察和认识，与强权横行的现实世界相对照，表现出十分明显的思想偏差。

洋务时期关于“理”与“势”的讨论，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国际政治理念的范畴，其中包含了文化争论的意味，又折射着这一时期国人普遍的精神状态。

#### 四、结语

在与西方世界相隔绝的年代，以自我为中心的天朝意识和强调文化血统的华夷观念，是国人对世界进行解释的原则性依据。而随着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进程，王道与礼治的标尺已不足以衡量当代中国的生存环境。与欧洲国际体系的长期隔膜，使国人在置身于新

世局的过程中，缺失了认识世界的理论依据。在这种背景下，依据经验知识和旧有的思想资源来演绎他们对当代世界的理解就成为必然的逻辑。以春秋战国时代比照当代世界大势，由以夷制夷观念揣度列强均势格局，乃至对国际政治体系作出以“理”为本的价值评判，表明历史经验与传统思想资源在国人体验近代世界体系过程中所发挥的引导作用。借助于春秋战国这一经验性的“模本”，国人勾勒了世界格局的基本轮廓，尽管它并不具有十足的说服力，但仍然成为洋务时期中国人认知世界一个重要的成绩。

这种认识方式对天下意识向世界观念的过渡固然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但也带来了无法避免的缺陷，国人注重于论证春秋战国与当代世界的一致性，合纵连横与均势格局的形似，而忽视了对时代本质的认识。他们对世界秩序偏重于道德而非权力的种种解释，对“理”的强调，固然表明了处于国际社会边缘地位的国人对世界公理与和平的期待，但又使他们难以真切体会与适应资本主义的时代氛围，更无从树立与世界潮流相合拍并把握其先机的国际观念。观念上的幼稚，导致了行动的滞后，毫无成效的洋务外交就是明证。

从今人的眼光来看，洋务时期国人对世界局势的认识显然并不具备现代意识，但在 19 世纪的语境中，它又有充分的合理性。尽管公法、均势之类的西方政治语汇同样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各种著述和文献中，但在整个 19 世纪，传统话语的强势地位仍然不容动摇。在某种意义上，洋务时期国人对世界的解读，可以理解为固有知识与思想传统的自觉延续。事实上，只有当传统话语的容纳弹性在扩张到极致而不得不破裂后，才会出现新、旧话语体系的更替——在近代中国人评判世界的过程中，这种更替的发生要到 20 世纪初年。

## How the Chinese to Cognite the World Situation in Times When Some Chinese Comprador Bureaucrats Introduced Technique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in the Later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Tian Tao

(History Department of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4)

**Abstract:** After the Second Opium War, China was drawn into the capitalist world system centered in western powers by a series of unequal treaties. In such circumstance, the Chinese tried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situation, especially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 There were some Chinese comprador bureaucrats introduced, with the imperial consent, technique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rule of the Qing government, which we often call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There were so many writings and talks about world situation that they became the mainstream languages of the Chinese realm of ideology as well as the whole society. Those were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comparing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with that of the periods of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observing the world ord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lance of power, and giving a value judgement of capitalist world political system. To a certain degree, the Chinese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could be understood as a conscious development of inherent knowledge and ideological tradition though the strong position of traditional languages was still unshaken at that time.

**Keywords:**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Chinese comprador bureaucrats; the world situation

收稿日期: 2003-10-31

作者简介: 田涛, 男,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 <sup>1</sup> 《瀛环志略》卷4，光绪24年老扫叶山房石印本，页13。
- <sup>2</sup> 《瀛环志略》卷7，页13。
- <sup>3</sup> 《瀛环志略》卷6，页5。
- <sup>4</sup> 冯桂芬：《重专对议》，《校邠庐抗议》（戴扬本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
- <sup>5</sup> 惠顿原著、丁魁良译：《万国公法》，张斯桂序，同治3年京都崇实馆版。
- <sup>6</sup> 郑观应：《易言·论公法》，《郑观应集》（夏东元编）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6页。
- <sup>7</sup> 王韬辑：《普法战纪》前序，光绪12年刊本，页1。
- <sup>8</sup> 《普法战纪》卷17，页35。
- <sup>9</sup> 何如璋：《使东述略》，罗森等：《早期日本游记五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9页。
- <sup>10</sup> 林乐知：《中西关系略论》，郑序，光绪8年申报馆代印本。
- <sup>11</sup> 王韬辑：《格致书院课艺》壬辰年卷上，光绪23年上海书局石印本，页6。
- <sup>12</sup> 《格致书院课艺》辛卯年卷下，页31、36。
- <sup>13</sup> 《格致书院课艺》庚寅年卷下，页42。
- <sup>14</sup> 王韬：《合六国以制俄》，《弢园文录外编》卷4，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8—119页。
- <sup>15</sup>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戚其章主编）（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57—358页。
- <sup>16</sup> 《格致书院课艺》壬辰年卷上，页19。
- <sup>17</sup> 求是斋辑：《皇朝经世文五编》卷24，光绪28年宜今室刊本，页4。
- <sup>18</sup> 魏源：《海国图志》（李巨澜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 <sup>19</sup> 《瀛环志略》卷3，页24。
- <sup>20</sup> 薛福成：《筹洋刍议·边防》，《薛福成选集》（丁凤麟、王欣之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29页。
- <sup>21</sup> 《普法战纪》卷20，页43。
- <sup>22</sup> 王尔敏文见《中国近现代史论集》第七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 <sup>23</sup> 薛福成：《庸庵文编》卷2，光绪13年刊本，页70。
- <sup>24</sup> 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卷3，光绪24年刊本，页29。
- <sup>25</sup> 《格致书院课艺》壬辰年卷上，页20。
- <sup>26</sup> 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薛福成选集》，第555页。
- <sup>27</sup> 《万国公法》第2卷，第1章。
- <sup>28</sup> 《万国公法》第1卷，第2章。
- <sup>29</sup> 《公法会通》卷1，光绪24年湖南实学书局校刊本，第95章。
- <sup>30</sup> 《公法会通》卷1，第98章。
- <sup>31</sup> 《格致书院课艺》壬辰年卷上，页21。
- <sup>32</sup> 郭嵩焘：《郭嵩焘奏稿》（杨坚校补），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410页。
- <sup>33</sup> 薛福成：《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卷6，光绪20年刊本，页17。
- <sup>34</sup> 马建忠：《巴黎复友人书》，《适可斋记言》卷2，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3页。
- <sup>35</sup> 《格致书院课艺》壬辰年卷上，页18。
- <sup>36</sup> 《普法战纪》卷15，页38。
- <sup>37</sup> 《普法战纪》，前序，页1、2。
- <sup>38</sup> 《普法战纪》卷6，页19。
- <sup>39</sup> 《普法战纪》，前序，页2。
- <sup>40</sup> 《普法战纪》卷19，页19。
- <sup>41</sup> 《格致书院课艺》壬辰年卷上，页29。
- <sup>42</sup> 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50，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页30。
- <sup>43</sup> 冯桂芬：《善馭夷议》，《校邠庐抗议》，第206页。
- <sup>44</sup> 《清季外交史料》卷16，页15—16。
- <sup>45</sup> 陈虬：《经世博议》卷4，光绪18年刊本，页7。
- <sup>46</sup>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5，文海出版社影印本，页1。
- <sup>47</sup>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08页。
- <sup>48</sup> 《格致书院课艺》壬辰年卷上，页20。
- <sup>49</sup>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247页。
- <sup>50</sup>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395页。
- <sup>51</sup> 黎庶昌：《西洋杂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2页。
- <sup>52</sup> 《皇朝经世文五编》卷7，页10。
- <sup>53</sup> 《普法战纪》卷20，页44—45。
- <sup>54</sup> 薛福成：《应诏陈言疏》，《庸庵文编》卷1，页20。

- <sup>55</sup> 郑观应：《盛世危言·边防二》，《郑观应集》上册，第 778、782 页。
- <sup>56</sup> 《格致书院课艺》壬辰年卷上，页 24。
- <sup>57</sup> 张佩纶：《涧于集》奏议卷第 2，民国 15 年刊本，页 20。
- <sup>58</sup>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张振鹞主编）（二），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312 页。
- <sup>59</sup> 《格致书院课艺》庚寅年卷下，页 37。
- <sup>60</sup> 郑观应：《盛世危言·边防二》，《郑观应集》上册，第 780 页。
- <sup>61</sup> （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 1 卷，第 440 页。
- <sup>62</sup>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 3 卷，第 1200 页。
- <sup>63</sup> 《薛福成选集》，第 194 页。
- <sup>64</sup> 《清季外交史料》卷 46，页 4。
- <sup>65</sup> 王韬：《越南通商御侮说》，佚名辑：《中法战争资料》，（台）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 44 页。
- <sup>66</sup> 汤震：《危言》卷 3，光绪 16 年刊本，页 15。
- <sup>67</sup>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二），第 312 页。
- <sup>68</sup>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 4，光绪 28 年刊本，页 1。
- <sup>69</sup> 郑观应：《盛世危言·公法》，《郑观应集》上册，第 387 页。
- <sup>70</sup> 《清季外交史料》卷 16，页 16。
- <sup>71</sup> 《公法会通》卷 1，第 96 章。
- <sup>72</sup> 《危言》卷 3，页 30。
- <sup>73</sup>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二），第 462 页。
- <sup>74</sup> 郑观应：《易言·论公法》，《郑观应集》上册，第 66 页。
- <sup>75</sup> 《格致书院课艺》壬辰年卷上，页 20。
- <sup>76</sup> 《涧于集》奏议卷第 2，页 10。
- <sup>77</sup> 《格致书院课艺》辛卯年卷下，页 32。
- <sup>78</sup>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 12，页 17。
- <sup>79</sup> 冯桂芬：《重专对议》，《校邠庐抗议》，第 214 页。
- <sup>80</sup> 冯桂芬：《善馭夷议》，《校邠庐抗议》，第 205 页。
- <sup>81</sup> 《郭嵩焘日记》第 3 卷，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52 页。
- <sup>82</sup> 《郭嵩焘日记》第 3 卷，第 518 页。
- <sup>83</sup> 《使西纪程原稿》，《郭嵩焘日记》第 3 卷，第 136 页。
- <sup>84</sup> 马建忠：《巴黎复友人书》，《适可斋记言》卷 2，第 38 页。
- <sup>85</sup> 黄庆澄：《东游日记》，罗森等：《早期日本游记五种》，第 250 页。
- <sup>86</sup> 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卷 6，光绪 20 年刊本，页 38—39。
- <sup>87</sup> 《格致书院课艺》己丑年卷上，页 6。
- <sup>88</sup> 郭嵩焘：《郭侍郎奏疏》卷 12，光绪 18 年刊本，页 5。
- <sup>89</sup> 郭嵩焘：《罪言存略小引》，《养知书屋文集》卷 3，光绪 18 年刊本，页 19。
- <sup>90</sup> 《郭侍郎奏疏》卷 12，页 6。
- <sup>91</sup> 郭嵩焘：《复方子听》，《养知书屋文集》卷 9，页 8。
- <sup>92</sup> 郭嵩焘：《上沈尚书》，《养知书屋文集》卷 9，页 11。
- <sup>93</sup> 《格致书院课艺》癸巳年卷下，页 52。
- <sup>94</sup> 郑观应：《易言·论公法》，《郑观应集》上册，第 65 页。
- <sup>95</sup> 《普法战纪》，后序，页 9、8。
- <sup>96</sup> 《清季外交史料》卷 29，页 30；卷 16，页 15、16。
- <sup>97</sup> 郑观应：《盛世危言·边防二》，《郑观应集》上册，第 780 页。
- <sup>98</sup> 曾纪泽：《曾纪泽遗集·日记》（喻岳衡点校），岳麓书社 1983 年版，第 365 页。
- <sup>99</sup> 薛福成：《庸庵文别集》（施宣圆、郭志坤标点）卷 3，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05 页。
- <sup>100</sup> 《清季外交史料》卷 46，页 4。
- <sup>101</sup>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 395 页。
- <sup>102</sup> 《格致书院课艺》庚寅年卷下，页 49。
- <sup>103</sup> 《清季外交史料》卷 50，页 30。
- <sup>104</sup> 《郭侍郎奏疏》卷 12，页 10。
- <sup>105</sup> 《郭侍郎奏疏》卷 12，页 37。
- <sup>106</sup> 王之春：《蠡测厄言》，《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376 页。
- <sup>107</sup>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 3，页 11。
- <sup>108</sup>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一），第 94 页。
- <sup>109</sup>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二），第 238 页。
- <sup>110</sup> 《清季外交史料》卷 36，页 23。

---

<sup>111</sup>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9，页14。

<sup>112</sup>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165页。